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普遍与差异

孙会军 著

do again . . . treat me with their a
ote in 1724, after the third rebuff.

Appealing prodigy was Truman Henry Sizell in Royalton, Vermont, he received

ity as a "lightning calculator" that he was invited to examine by a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上海译文} Sciences. At the behest of President Edward C.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普遍与差异

—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孙会军 著

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 孙会军著.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 - 5327 - 3848 - 5
I. 普... II. 孙...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15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普遍与差异
——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孙会军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8,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册

ISBN 7 - 5327 - 3848 - 5/H · 713

定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 1989 年与 1993 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 20 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 20 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 3 位之外，其余 17 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 20 位代表人物被列入 6 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 5 个流派都是近 50 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 20 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5年9月18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絮论	/1
第一节 引言	/3
第二节 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7
第三节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转向	/19
第四节 后殖民批评理论	/25
第五节 后殖民翻译研究	/31
第二章 权力与翻译	/53
第一节 原作、原作者在翻译中的凌驾权力	/56
第二节 权力话语与翻译	/61
第三节 权力的差异与翻译的政治	/66
第三章 普遍与差异	/83
第一节 对普遍性的诉求	/85
第二节 普遍性的误区	/95
第三节 普遍主义的根源	/103
第四节 对差异的诉求	/111
第四章 东方学与翻译	/117
第一节 萨义德与《东方学》	/120

目 录

第二节	被美化的东方形象	/123
第三节	被丑化的东方形象	/132
第五章 民族主义与翻译		/137
第一节	民族主义	/139
第二节	殖民地文化的发展走向及其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影响	/140
第三节	求同:对现代性的追求	/145
第四节	求异: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勃兴	/152
第六章 “杂合”:异化与优化		/161
第一节	“杂合”:翻译的手段与结果	/163
第二节	“杂合”:目的语文化的优化	/168
第三节	“杂合”:抵抗的手段	/170
第七章 拥抱差异		/179
第一节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181
第二节	倾听他文化的声音:从独白到对话	/185
第三节	差异的传达:译者的“陌生化”取向	/187
第四节	读者对差异性译文的期待	/192

目 录

第五节 异化法、归化法溯源	/193
第六节 归化法以及对归化法的质疑	/195
第七节 异化法：拥抱差异	/200
第八节 归化与异化——两个动态的概念	/214
第八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普遍性和差异性	/223
第一节 后殖民状况下的“全球化”趋势	/225
第二节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文化观	/227
第三节 文化“全球化”：和而不同	/229
第四节 文化的“全球化”与翻译	/231
第五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译学研究走向	/233
第九章 结论	/245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72

第一章

绪 论



这本书即将收尾的时候，恰逢新年钟声刚刚敲响。虽然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第五个年头，人类仍然在面对着翻译这一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关于翻译所引发的思考不但远远没有终止，而且有增无减；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方兴未艾。

翻译之事，由来已久。关于翻译的由来，金圣华女士在她的《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中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

翻译就像一座桥，桥两端，气候悬殊，风光迥异。两端之间，原隔着险峻的山谷、湍急的溪流。两旁的人，各忙各的，世代相传，分别发展出一套不同的习俗风尚以及语言文化来。

有一天，这不同文化习俗的人，忽然想起要跟对岸打个招呼。怎么办？要渡过峡谷，不得不起来一座桥……①

从本质上说，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恰如一座桥梁，把两个相异的文化连接起来，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角色。而频繁的翻译活动又引发了人们对翻译问题的思

① 金圣华，《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 年，第 3 页。

考。人类对于翻译的思考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人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翻译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文艺学、美学、人类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学者都以翻译为突破口,通过翻译研究来寻求他们自己研究问题的答案。这些相关领域的参与一方面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们对于翻译活动本质、规律的认识,同时翻译理论界的鲜明的学科意识也逐渐表现出来^①。把翻译看作是语言学或文学分支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一种机械的转换过程,翻译工作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技能。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外,随着翻译理论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人们发现:翻译涉及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所以人们应该把翻译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再者,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翻译问题。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撰写文章,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 translation 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

① 国际翻译理论界表现出鲜明的学科意识始于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他在 1972 年发表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探讨了翻译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性质和范围等问题。1978 年,勒菲维尔建议将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翻译学科的正式名称,为后来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进入 80 年代之后,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表现在设立独立的翻译系和翻译专业的大学,据某些学者统计,从 60 年代的 49 家发展到 1980 年的 108 家;另外巴斯内特出版了第一本以“翻译学”为书名的学术专著;1981 年创办了翻译研究的国际性学术杂志 *Target*,这本杂志在 1989 年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理论研究中来^①。把文化当作“翻译单位”的提法在笔者看来似乎有些欠妥,但她对文化的强调使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McGuire)和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从中看到了更为重要的思想内涵,认为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这一提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场变革,他们把这场变革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②。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一提法力图使人们认识到,翻译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还应该包括翻译的外部研究,即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翻译的内部研究关注从文本到文本之间的转换过程,注重解决翻译过程中文字的转换问题,追求译文与原文在形式或是效果上的对等。而翻译的外部研究则关注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选择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这样的研究对于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和丰富翻译理论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就是笔者在“文化转向”这一潮流影响下对翻译研究所进行的一种再思考,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或宏观研究。翻译的外部研究或宏观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即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大体说来,本书应该属于宏观的翻译研究的第三种类型,即通过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实以及具体的翻译方法的采用来考察译者或是他(她)所代表的文化对

^① Mary Snell-Hornby. “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ed). Bassnett and Lefevere. 1990. pp79—86.

^② Susan Bassnett-McGuire and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 p12. 此处译文为笔者自译。下面除具体指出译文出处外,均为笔者自译。

原语文化的态度,因为翻译虽然看上去是译者个人的行为,但译者本人的某些观念往往是其所属的整个文化群体的各种观念的反映。译者对待原语文化的态度往往表现出其所属文化团体的“集体无意识”^①,暴露出目的语文化对原语文化的态度与看法。

在资料准备与文献阅读的过程中,笔者逐渐认识到,“把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价值中立、动机单纯的、原语文本得到透明彰显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侵越行为。翻译作品和翻译活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不应像以往那样不受重视。”^②而关注政治和权力差异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恰巧可以对翻译背后运作的政治、文化因素进行较为深入、全面、准确的诠释。“后殖民批评与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交合点是差异问题”^③。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差异的张扬,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内容是对原文中差异性因素的处理。如同布朗绍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④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以后殖民批评为理论工具,站在文化批评的高度,以差异性(difference)及与其相对应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概念为切入点,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对原语文本中差异的视而不见或是刻意抹煞所映射出来的政治(种族中心

① “无意识”的概念是首先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而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ric Jameson, 1934)在他的《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试图用社会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或是抽象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前人关于“无意识”的概念。

② 苏珊·巴斯内特,参见陈德鸿、张南峰主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③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134.

④ Maurice Blanchot,参见陈德鸿、张南峰主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